



铭记历史 珍视和平
東南亞華僑抗日史料叢書

丛书之十一

日本集中营生活纪实

(武吉杜里——西冷——芝马圩)

印尼 梁友兰 著

梁英明 译

梁俊祥 再版责任编辑



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三十八

日本集中营
生活纪实

(武吉杜里——西冷——芝马圩)

[印度尼西亚] 梁友兰 著
梁英明 译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

日本集中营生活纪实

策 划：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著 者：梁友兰

译 者：梁英明

再版责任编辑：梁俊祥

出 版：生活文化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 26-28 号富腾工业中心 1403 室)

电 话：26930551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2015 年 8 月 第 2 版

印 数：1000 本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988-14309-5-3

2007 年北京大学龚诗贮基金赞助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初版

2015 年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赞助再版

日本集中营生活纪实

(武吉杜里——西冷——芝马圩)

(印度尼西亚) 梁友兰 著

梁英明 译

总 序

梁英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和许多有关国家都以各种形式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目的是提醒后人铭记历史，总结历史，珍惜和平，维护和平。

为此，香港的东南亚归侨决定重新挖掘和搜集有关东南亚各国华侨抗日斗争的史料，编辑出版一套《东南亚华侨抗日史料丛书》，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尽管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但是我们这些老归侨，作为那场浩劫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今天重温东南亚华侨当年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经历过的苦难生活记忆，再次听到他们对侵略者的控诉，看到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感受到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和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这一切仍然使我们心潮澎湃，难以忘怀。

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这个阶段，东南亚华侨主要的抗日活动是通过捐献财物，支援中国抗战。第二个阶段是从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占领东南亚各国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在这个阶段，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从支援中国抗战转变为直接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以及秘密为盟军提供情报活动等。这套丛书的内容，自然也涵盖了这两个阶段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史实。可以说，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历时之久，范围之广，牺牲之大，在海外华侨反压迫斗争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众所周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人民已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抗争，而自1937年

“七七事变”算起，中国人民也已展开了四年多的全面抗战。祖国处在危亡关头，家乡亲人生死未卜，远在东南亚的华侨自然感到悲愤难平，把抗日救国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时，东南亚各国是西方列强统治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虽遭到损失，但为保护它们作为东南亚殖民地“宗主国”的既得利益，却依然心存侥幸，对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行动采取“中立”立场，因而对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施加种种阻挠和压制。

与此同时，长期处于欧洲列强殖民统治和压榨下的东南亚各国原住民，以及他们的部分政治领导人，也曾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认识不足，甚至幻想利用日本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以为可以借此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从此获得民族独立。

直到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突袭珍珠港，日军大举南下，迅速占领东南亚各地，这些西方“宗主国”才被迫仓促应战，但显然为时已晚。这时，法国、荷兰已遭到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蹂躏，隔着海峡的英国也已岌岌可危，实际上无力抵抗日军的进攻。结果是，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如入无人之境，英、法、荷兰守军以及澳大利亚援军闻风丧胆，节节败退，最后只好相继宣布投降。从此，东南亚华侨与当地各族民众一起，在日军的刺刀下度过了三年半的苦难岁月。

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形势下，早在太平洋战争前，东南亚华侨就率先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他们克服重重阻力，以“筹赈祖国难民”的名义，开展了形式多样、规模宏大和持续多年的支援中国抗战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是华侨社会大团结的一次空前的总动员。

当时，东南亚各地华侨的抗日活动，主要是募集捐款和中国抗战所急需的物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后，中国军民在极其艰难困苦条件下浴血抗战的事迹，进一步鼓舞了东南亚各地华侨的爱国精神，华侨捐款捐物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各地的爱国华侨学校、华侨报刊和华侨社团，成为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力量。不仅华侨

大商家慷慨解囊，华侨工人、商贩、三轮车夫也为支援祖国抗战而献出自己的微薄收入。陈嘉庚先生曾将海外华侨广泛深入的抗日救国行动概括为“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各地华校师生则通过文艺义演、义卖等活动募集捐款。当年在各地华侨聚居的街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华侨中小学生背着捐款箱挨家挨户募捐的身影。

根据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捐款为国币 13 亿多元。实际的捐献总额显然大大超过这一数字，因为各地华侨同时通过其他途径，将捐款直接汇寄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以及广东、福建等地的中国军队和慈善团体，而这些捐献并没有包括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上述统计数字内。同时，东南亚各地华侨还募集了大量寒衣、药品等，寄往中国抗战地区的军民。这些物品的总价值更是无法统计。

与此同时，海外华侨为了赡养在国内的亲属，每年都通过各种途径汇款到家乡，通称为侨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侨汇是中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当年中国弥补外贸逆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国政府财政部统计，1937—1943 年，海外华侨通过银行寄回国内的款项约为国币 56 亿元，而通过各地民信局和商号汇寄的“侨批”并没有包括在内。因此，侨汇对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此外，东南亚华侨还积极购买中国政府发行的抗战公债。直到抗战胜利后，绝大多数购买了公债的华侨并没有要求中国政府偿还这些公债。实际上，当年华侨在购买抗战公债时，就是一心要支援祖国，只要祖国抗战胜利，根本没有想要中国政府日后偿还这些公债。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地还有许多华侨青年学生冲破重重阻挠，告别双亲，毅然回国，与祖国军民一起浴血奋战，不少人为此血洒疆场。其中，李林烈士就是著名的代表之一。直到今天，《告别南洋》的悲壮歌声，仿佛还在我们耳际回响。

在动员和组织东南亚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工作中，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南亚各地华侨成立的各种形式的筹赈会或赈济会等团体，

如新加坡筹赈会、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伤兵大会、菲律宾援助抗敌委员会、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缅甸华侨救灾总会等，都曾发挥动员、组织当地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积极作用。

为了统筹东南亚各地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泰国等地45个城市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的代表168人出席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荷属东印度华侨代表）和李清泉（菲律宾华侨代表）为副主席。南侨总会的办事处设在新加坡，南洋各地均建有分会。南侨总会的成立，使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掀起新的高潮，也使这一爱国运动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到1940年，南侨总会的基层组织已增加到702个。

除了动员、组织和领导东南亚华侨筹赈祖国难民的行动以外，南侨总会对中国抗战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动员华侨捐献了300多辆卡车，同时组织3200多名南侨机工一起回国，投身于滇缅公路的抗日物资运输任务。这些华侨热血青年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日夜奋战在崇山峻岭的蜿蜒公路上，其中1000多人在那里光荣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南侨机工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地相继被日军占领。华侨的抗日活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此后，在日本侵略军的统治下，东南亚华侨已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公开进行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那些在战前曾领导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华侨社团领袖则先后遭到日本占领当局逮捕，并被关押在各地的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与此同时，除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在东南亚分别进行抗日活动外，当地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或配合盟军秘密进行情报搜集和联络工作。其中著名的抗日武装组织就有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盟军136部队的中国龙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即48支队）等，以及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泰国反日大同盟、印度尼西亚华侨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等抗日组织。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了长达十几年的艰难曲折的抗日救国运动。东南亚华侨的英勇斗争和为此做出的巨大牺牲，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这些斗争和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

对东南亚华侨的抗日运动，我们应该赞扬华侨热爱祖国的精神，称颂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功绩。这个评价当然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一评价还不足以概括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主要是出于热爱祖国的精神，那么，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南亚以后，他们的抗日斗争就不局限于热爱中国、保卫中国的斗争，而同时是热爱和保卫他们在东南亚家园的斗争，他们的斗争自然是居住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保卫世界和平与人类正义事业的组成部分。直接打击日军主力军，有力削弱制约了日军在华的军力，间接继续支援了中国抗日主战场的战斗。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南亚以后，东南亚华侨和当地各族人民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日本占领者的残暴统治与压迫，使当地人民对这个自称的“亚洲解放者”的幻想迅速破灭。因此，东南亚华侨开展的抗日斗争，实际上与当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是相互支持，休戚与共的。同时，华侨在与各民族抗击共同敌人的战斗中，也必然增强了落地生根的主人公意识。因此，许多人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实际上为华侨后裔从外国侨民的身份转化为当地公民身份奠定了基础，自然也使他们在战后成为当地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洋战争是东南亚华侨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各地已有漫长的历史。东南亚华侨在文化认同等方面实际上早已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日本占领东南亚各国后，对当地华侨采取与对待西方人和当地原住民不同的政策，如将参与抗日活动的华侨称为“敌性华侨”，将他们的领导人逮捕入狱，又与欧洲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并给予不同的待遇，关闭原有的西方语文学校，同时为拉拢华侨，又允许华文小学在表示效忠南京汪伪政权的前提下继续存在，等

等。所有这一切，在战后初期对东南亚华侨社会的演变以及华侨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

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复杂的历史画面，而历史从来就不可能是单一色彩的。从东南亚华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一特殊历史阶段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太平洋战争前后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对东南亚各国现代历史以及战后华侨社会的发展变化，如东南亚华侨与当地民族独立运动关系的发展变化，东南亚各国独立后的原住民政权对华侨政策的发展变化，以及各国华侨后裔与当地不同族裔间关系的发展变化等等，无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这段历史资料的保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对它认真进行挖掘、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当然，我们今天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既需要掌握更完整的历史资料，也需要树立科学的历史观，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不是将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的意义仅限于支援中国抗战，而应该将这一斗争作为东南亚现代历史发展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也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察分析。

在这场战争结束 70 年后的今天，香港文化生活基金会在出版《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之后，再次得到广大归侨以及各界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同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手，牵头组织，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和出版包括十六种图书和音像资料的《东南亚华侨抗日史料丛书》，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完全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我对所有为完成这一重大工程而不辞辛劳、默默奉献的仁人志士深表钦佩，对他们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坚强毅力，致以由衷的敬意，同时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得到社会各界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使它得以继续深入进行下去。我认为，我们研究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事迹以及华侨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是为缅怀先辈，悼念亡魂，更是希望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为后代昭示未来。

2015 年 7 月于北京大学



译者简介：

梁英明，祖籍广东新会，1931 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梭罗市。

1950 年在雅加达巴城中学毕业后，留校任中文和历史教师。曾任雅加达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秘书，《学联月报》主编，《中学生月刊》主编及雅加达华校教师公会秘书等。

1955 年回国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60 年毕业后留系任教，兼任系科研秘书及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等。1964 年调入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1983 年 10 月起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从事研究工作一年。1990 年晋升教授。

1992 年起获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东盟 (ASEAN) 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华人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顾问及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顾问等。业绩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名人录》、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出版的《名人录》和印度 Rifacimento International 出版的《亚洲太平洋名人录》等。

主要著作：

- 《东南亚历史词典》（常务编委）
-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副主编）
-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副主编兼经济卷主编）
- 《融合与发展》（作者）
- 《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作者）
- 《东南亚华人研究——新世纪新视野》（作者）
- 《东南亚近现代史》（合著）
- 《东南亚史》（作者）
- 《誉满羽坛功载史册》（作者）
- 《张国基诗文选》（主编）
- 《拼搏与奉献——印度尼西亚归侨林慧卿的乒乓球人生》（作者）

主要译著：

- 《近代亚洲史料选辑》（合译）
- 《洪渊源自传》（译者）
- 《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合作编译）
- 《华侨与抗日战争》（编委兼英文审校）
- 《日本集中营生活纪实》（译者）
- 以及学术论文多篇。

缅怀我挚爱的母亲

一位母亲以她最后的力气在呼唤她的儿子。

“娘要等他回来，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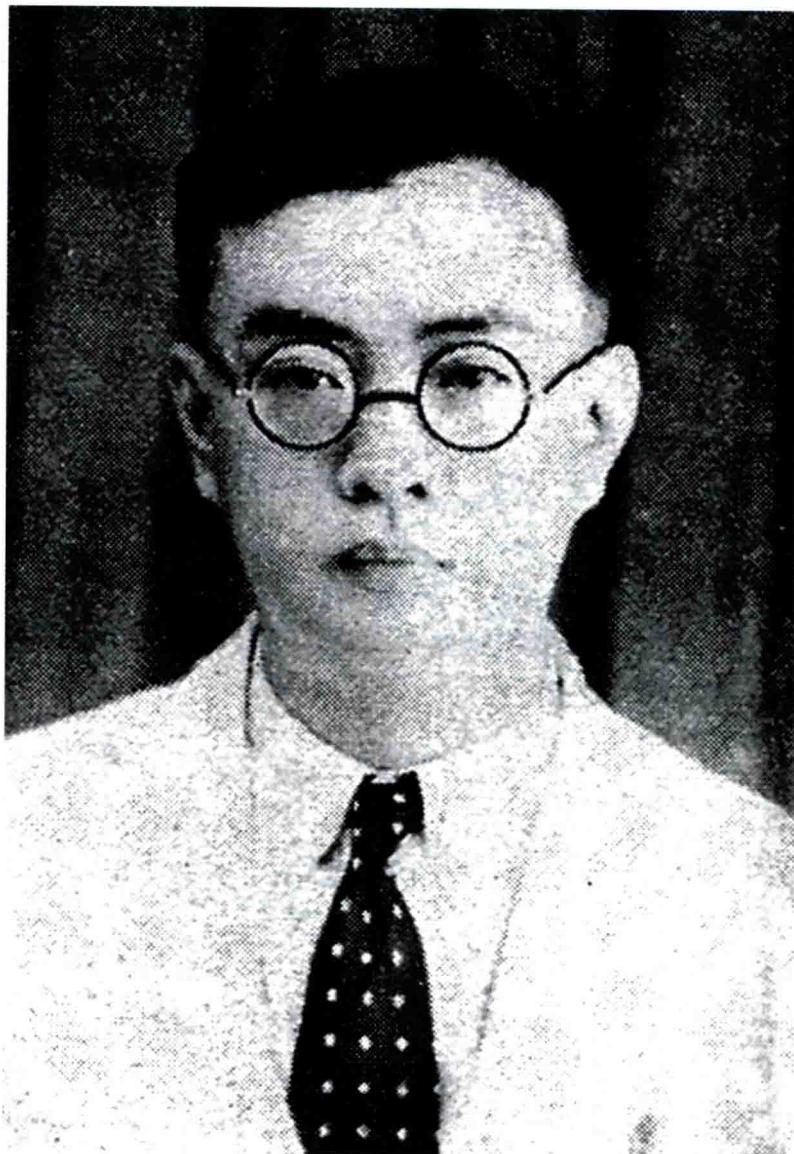
她的儿媳妇央求她说。

母亲眼含泪水无力地点点头，

这是她唯一的回答……

当儿子回来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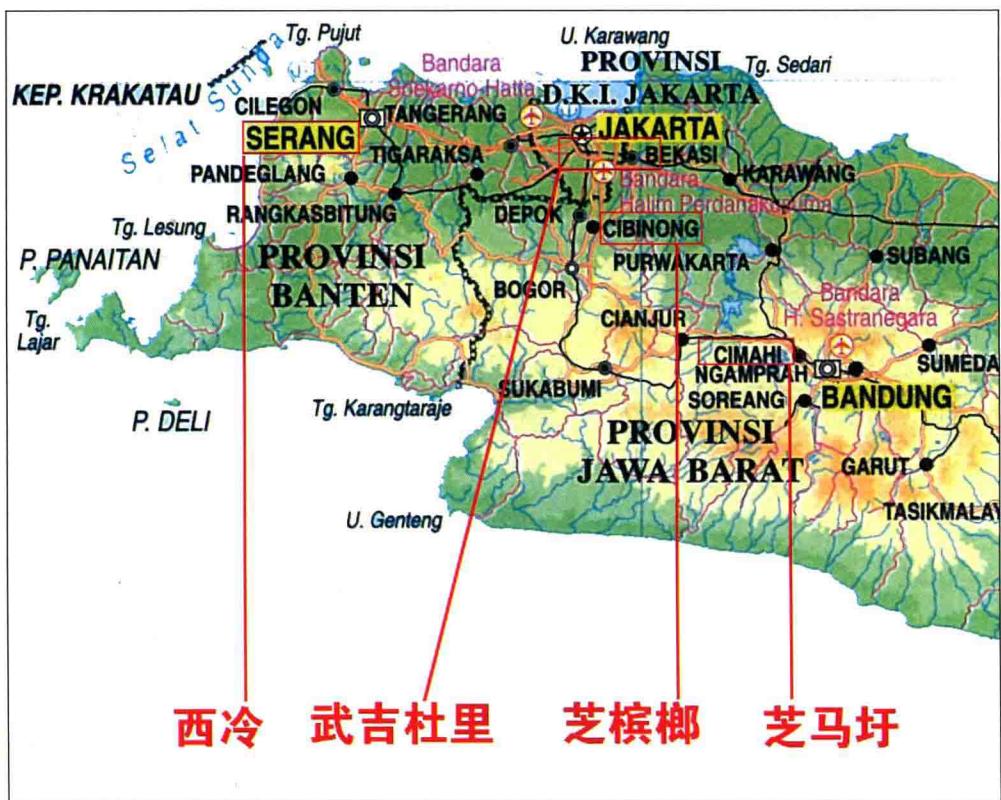
才发现已经晚了整整 3 个月……



作者：梁友兰 (Nio Joe Lan 1904–1973)



爪哇岛



西爪哇

1942年2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西爪哇登陆，占领荷属东印度爪哇岛，大肆抓捕敌性华侨，先后关押在西冷、芝槟榔、芝马圩的集中营。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本集中营的生活实录，这是一份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有力罪证，这也是一页印度尼西亚华人苦难而光荣的历史。书中没有激昂的口号，也没有悲伤的哀叹。作者只是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敏锐观察力，用大量具体生动的事例，真实地记述了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本书作者是印度尼西亚著名华人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梁友兰（Nio Joe Lan, 1904—1973），又名尤努斯·努尔·阿里夫（Junus Nur Arif）。梁友兰祖籍广东梅县，生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父亲曾在红牌地区经营一家生产蜡染布的企业。梁友兰在雅加达的荷华小学毕业后，进入威廉米娜女王职业中学学习，并开始补习华文。

1924年梁友兰中学毕业后，在他父亲企业担任经理的荷兰人突然卷款逃走，致使家庭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生活困难。梁友兰无法升学，开始独立谋生，并帮助弟妹们继续读书。他先在马来文《竞报》编辑部任职，1928年因总编辑侯德广逝世，由梁友兰继任。1935年《竞报》被《新报》收购后，他转到马来文《新报》编辑部工作，直至1942年4月被日本占领军逮捕，先后被关押在武吉杜里、西冷和芝马圩的集中营内。战后，《新报》复刊，他继续在《新报》任职。1958年退休后，专心写作。

梁友兰热心为社会服务，1928年起，先后当选巴达维亚中华会馆理事兼秘书、财务委员会委员及华人失业基金会理事等，直至1942年日军占领印度尼西亚。1955—1960年任雅加达一所师范学院的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讲师，1960年被委任为印度尼西亚政府电影审查委员会成员。

本书原名为“DALEM TAWANAN DJEPANG (Boekit Doeri——Serang——Tjimahi)，Penoetoeran penghidoepan interneeran pada djeman pendoedoekan Djepang”，雅加达莲花公司（Lotus Co.）1946年出版，竞报